

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：中国近代史



[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：中国近代史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《中国近代史》编写组 编

[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：中国近代史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内容全面，讲解详细，很不错的教材。

挺好的，有点点贵哦

很好，物美价廉，很划算，不错的宝贝

本书真的不错。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。我喜欢看书，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，看的很杂，文学名著，流行小说都看，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，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。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，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。所以来这里买书是非常明智的。

权威出版，价格较贵，值得一读。

一本给史学专业用的近代史教材，内容比较丰富。可是个人认为有些观点还是有待商榷。我更希望教材的研究性和启发性强一些。

很棒加油背书！！！！

京东书城，实惠到家，调货速度也很快！

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

这本教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之一，作者都是业界的知名学者，质量是有一定保障的。编写时，吸收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，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，书后有参考书目和索引。在教材里面，是不错的一本。

给力

整体良好，内容较差。

不错

四、国民党的改组

孙中山确定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政策，中国共产党也确立了与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的方针后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施。孙中山决定第一步是对国民党进行改组。此时的国民党，是一个组织比较松散的政治团体，难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，无法有效团结各种革命力量，真正发挥领导作用。

1923年10月，应孙中山的邀请，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。鲍罗廷同中共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，决定力促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。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结束后又移往上海，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。

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，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。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，孙中山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（后又聘为政治顾问）。他还任命廖仲恺、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。10月25日，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。28日，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，孙中山委任廖仲恺、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，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。

此后，各地的共产党人，如北京的李大钊，直隶的韩麟符、于方舟，湖南的毛泽东、何叔衡，山东的王尽美等人，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。在欧洲，旅欧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80多人于1923年6月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。同年11月，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，新选举的评议部有半数成员是共产党人。

1923年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中央通告第十三号》，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，要求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，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中共中央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还召开联席会议，制定了党、团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时的统一行动方针。

四、国民党的改组
孙中山确定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政策，中国共产党也确立了与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的方针后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施。孙中山决定第一步是对国民党进行改组。此时的国民党，是一个组织比较松散的政治团体，难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，无法有效团结各种革命力量，真正发挥领导作用。

1923年10月，应孙中山的邀请，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。鲍罗廷同中共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，决定力促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。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结束后又移往上海，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。

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，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。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，孙中山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（后又聘为政治顾问）。他还任命廖仲恺、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。10月25日，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。28日，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，孙中山委任廖仲恺、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，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。

此后，各地的共产党人，如北京的李大钊，直隶的韩麟符、于方舟，湖南的毛泽东、何叔衡，山东的王尽美等人，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。在欧洲，旅欧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80多人于1923年6月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。同年11月，国民党旅欧支部在法国里昂举行成立大会，新选举的评议部有半数成员是共产党人。

1923年12月25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中央通告第十三号》，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，要求各地党组织争取做到每省有一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代表，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中共中央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还召开联席会议，制定了党、团员在参加国民党一大时的统一行动方针。四、国民党的改组孙中山确定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政策，中国共产党也确立了与国民党开展党内合作的方针后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施。孙中山决定第一步是对国民党进行改组。此时的国民党，是一个组织比较松散的政治团体，难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，无法有效团结各种革命力量，真正发挥领导作用。

1923年10月，应孙中山的邀请，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。鲍罗廷同中共商议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，决定力促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。由于中共中央在三大结束后又移往上海，这项工作主要是在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党组织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。

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，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。为了具体筹划改组工作，孙中山聘请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（后又聘为政治顾问）。他还任命廖仲恺、汪精卫和共产党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。10月25日，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。28日，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，孙中山委任廖仲恺、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，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。

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中，中国的近代是突然到来的：传统教科书都强调1840年*战争的指标性意义，当时这个已昏睡百年的帝国被洋人的枪炮惊醒，从此不情愿地被人卡着脖子、步履蹒跚地拖进现代化的角斗场，从而与其过往的悠久历史产生一个深刻的断裂。这个主导性的说法突出了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被动性与紧迫感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“挑战-回应”模式。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和对历史的更深入考察，现代学者更乐于关注动态的变化和中国人作为主体的主动奋斗，认为不应过多强调被动反应。徐中约的这本著作（其英文标题《现代中国的兴起》也许更适合）无疑也是围绕着这一主线展开的，在他看来，中国近代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历史。

将历史设想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进程的观念，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出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哲学，这也有助于说明在中国人身上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。近代以前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，其维度都指向悠久的远古；但在现代化浪潮的不断猛烈冲击下，晚清民国时的国人逐渐将乌托邦设置到遥远的未来，人们努力的方向发生了决然的变化，这代表着精神上的一个巨大转折，也是理解这一时期的一个关键。

中国近代史是一连串的惨败。它们是国人心头迄今仍未愈合的伤口——失败者总是难以释怀，那种怨恨与悲愤，仍在时时浮现。少年时我总想回避这段惨痛的历史，然而年事渐长后慢慢意识到：正是这一连串的惨败，才迫使中国社会在痛苦的全面危机之中艰难地完成了转型。失败导致的危机越深重，尾随而至的变革就越激进。本书还指出了以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：即近代史上的军事或外交胜利，往往导致一个消极后果，即保守势力的抬头。例如1881年曾纪泽的外交胜利和1899年成功拒绝意大利租借三门湾，都造成清议派士大夫过分自信，使他们误以为只要强硬对外，洋人终将退让。这种建立在对实力的错误估计之上的盲目乐观，是中法战争和义和团事变中中国失败的重要因素。

历史书过于强**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心理上就已经进入了近代。实际上，在甲午战争以前，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感觉到自己“进入了近代”。第一次使朝野上下产生变革的强烈危机感的事件，并非外部发生的*战争，而是内部爆发的、人类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：太平天国战争。只有当接二连三的失败不断地暴露出中国的深层次问题，才逐渐逼迫全社会意识到，修修补补的有限现代化无济于事，必须有一场更彻底的改革甚至革命。然而弱者的选择通常都很小：当全社会就变革本身达成共识的时候，危机早已积重难返，最终往往是“改革摧毁了改革性政府”。

只有在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我们才会对近代历史人物具备应有的理解之同情。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化，本身就会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，尤其当这种现代化是外来和强加的时候（因此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），但社会稳定却又是现代化的保证。面临内忧外患的近代历届中国政府，要在无力控制社会动荡的局势下实现现代化，其艰难程度犹如在一辆飞奔的破车上试图更换轮胎一样。

即使是那一时期的顽固保守人物，他们同样是那个悲剧性时代的产物，不应被简单地唾弃。人的本性总是倾向于抵制变革，不要忘记，1855-1870年英国也曾抵制文官考试制度长达15年，原因仅仅在于“这个计划是中国式的”，它骄傲地认为自己无须向别国学习。张之洞提出的“中体西用”也常被谴责为不彻底的变革，然而日本近代也一样曾提出“和魂洋才”，将西方文明视为对传统道德的完善而不是取代。的确中国不是日本，张之洞的方案在当时无力挽狂澜于既倒，但如果丧失了“中学为体”，中国人也就不得不吞下一个苦果：我们到底是谁？

这就是近代中国的不断激进化后产生的异化问题：“原先是为了改革现有的传统，以强化民族文化生命，才去吸收西学，最后却被异化了。变成：为了吸收西学，即必须放弃民族文化。”（龚鹏程《近代思潮与人物》）到民国时代，保守派几乎被彻底打倒，代代均惟恐破坏得不够，中医、国学、乃至一切传统文化，都被列入全面破坏的范畴之内，而很多价值观念和制度在被充分取代之前已经遭到破坏。近代史上维新/保守不应是脸谱化的道德评判，不幸两者在现实政治的洪流中彻底丧失了平衡，而未能将一个更健康的中国完整地带入现代。

虽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，但从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，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，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，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。书中亦旁及军事、地理、文化、经济诸问题，却也只限于阐明门阀政治的需要。

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，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再探索，认为中外学者习称的魏晋南北朝门阀政治，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；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，具有暂时性与过渡性，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。本书不落以婚宦论门阀士族的窠臼，对中国中古政治史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精辟的见解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

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丛书之一，老师推荐的中国近现代史标配教材，内容还算翔实，基本描述概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诸多历史细节，目前市面上近现代史史门类繁多、此书还是不错的

[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：中国近代史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：中国近代史_下载链接1](#)